

文章编号: 2096-1383 (2024) 06-0485-06

# 论历史移民与民族交融互嵌

——以三线建设为讨论中心

陈文元

(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剖析三线建设与民族交融互嵌的关联性, 探究历史移民的内涵、特点及其规律, 为构建新时代各民族人口流动与交融“中国经验”做有益尝试。通过分析可知, 三线建设和因三线建设而产生的大量“三线移民”, 既扩展了民族互动空间, 更丰富了民族交融元素, 深刻影响了中国民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体表现为人口结构、社会发展、生活条件、文化形态、国家认同等五个方面。总结三线建设促进民族交融互嵌的特点, 主要包括国家政策主导、经济因素助推、层级交互突出和群体涉入多元。

**关键词:** 历史移民; 民族交融互嵌; 三线建设; “三线移民”

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志码: A

DOI:10.13744/j.cnki.cn21-1431/g4.2024.06.015

## On the Interembedding of Historical Immigration and Ethnic Integration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ird Line As the Discussion Center

CHEN Wenyu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Immigration is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development, but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ethnic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third-line immigrants" produced by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not only expand the space of ethnic interaction, but also enrich the elements of ethnic integration, and profoundly affect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China's ethnic areas. It is manifested in five aspects: population structure, social development, living conditions, cultural form and national identity.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line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ethnic integration and intermingling, mainly including national policy dominance, economic factors, prominent hierarchical interaction and group involvement.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e-line construction and ethnic blending, and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historical immigration, is a useful attempt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the monility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population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historical immigrants; ethnic integration and intermingling; third-line construction; third-line migrants

收稿日期: 2024-04-16; 最后修回日期: 2024-05-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口流动与深度交融的动力机制研究”(21&ZD212); “贵州省青年学术先锋建设资助”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委托课题)“贵州三线建设促进民族交融互嵌调查研究”(GZSLLXKT-WTKT-2023-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文元(1989-), 男, 湖北蕲春人, 副教授,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民族文化繁荣发展”高端智库特聘研究员, 主要从事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历史人类学研究。

有关中国移民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或聚焦整体,或专题研讨,不一而足<sup>①</sup>。中国各民族交融互嵌形态是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移民乃型构这一形态的重要原因。移民不仅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动力,更是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式之一。经由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移民运动,民族互嵌程度不断深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

三线建设移民(以下简称“三线移民”)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较大的一次移民运动,因三线建设引发的数百万移民进入中国西南、西北地区,久之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移民称谓——“三线人”。“三线移民”的迁入与融入,经年久月积累,促进了各民族多维度的互动互嵌互融。既往的三线建设研究,主要关注国防战略、西部开发、经济建设、文化遗产、社会记忆等领域<sup>②</sup>,从历史移民的角度探讨民族交融互嵌方面不为多见。基于此,笔者拟从历史移民角度出发,分析三线建设、“三线移民”的源起、构成,探讨三线建设促进民族交融互嵌的方式、类型及特点,进而思考历史移民与民族交融互嵌的关联性,以期深化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演变脉络,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证研究。

## 一、三线建设与移民

20世纪60年代,鉴于国际形势变幻,为打造战略腹地,扩大纵深,也为加强国防建设和东西部经济均衡发展,党中央高瞻远瞩,依据各地区战略情形,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大致上,将沿海沿边定为一、二线,四川(包括重庆)、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等地区为三线(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其余中部地区为二线。三线建设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重点发展国防、军工、科技、铁路、机械、钢铁、电力等核心工业。三线建设又分“大三线”和“小三线”,其中一线、二线腹地的三线建设即为“小三线”。

出于“民族交融互嵌”研究主旨,本文探讨的对象主要是“大三线”。

为启动三线建设,国家从东北及沿海工业重地调拨400余万解放军战士、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等开展三线建设<sup>[1]</sup>。如果将“三线移民”后续家属迁入及其二代、三代的人口结构变化计算在内,则移民总数在1000万以上。不可否认,三线建设中有些军工项目属于保密性质,一定时期存在“文化孤岛”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1980年代政策放宽、改制转型,移民亦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时至今日已呈交融互嵌态势。而且,并不是所有三线建设机构高度保密或长时间封闭,诸如钢铁、交通、制造等领域的“三线移民”与当地各民族长期相处,日益交融。“三线建设史不仅是新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部工业发展史、经济建设史,也是一部人口流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sup>[2]</sup>这场移民运动自1964年开始,至1982年初步结束,历经18年,横跨13个省区,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浪潮。这批移民当中,除了少量的满族、回族等,绝大部分是汉族。“三线移民”跋山涉水进入祖国的大西南、大西北山区、荒漠,与各族人民一道建起大批的工厂、企业、科研机构、航空航天基地,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兴起,构成民族互嵌式社会。三线建设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交融互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篇章,既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又促进了各民族互动互嵌互融,实现了边疆与内地的进一步整合。质言之,一部“三线建设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交融互嵌史。

## 二、三线建设促进民族交融互嵌体现

三线建设初衷是“巩固国防”“稳定后方”,而非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三线移民”不断迁入西南、西北地区,各民族集中聚居又多民族交错杂居,“三线移民”与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层面长时间交流与互动,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沉淀,

①相关成果有: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葛剑雄、安介生:《四海同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冻国栋:《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郭红:《明代卫所与民化:法律·区域》,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杨洪林:《历史移民与武陵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等等。

②相关成果有:陈东林:《三线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蒋辛:《青春的回眸:三线建设者的奋斗故事》,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邓国超:《好人好马上三线:贵州三线记忆口述实录》,孔学堂书局,2019年;张勇:《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刘伯英:《中国工业遗产调查、研究与保护》,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朱云生、何悦:《三线建设之光》,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等等。

最终实现了各民族间深度交融互嵌。

### 1. 改变民族地区人口结构

自三线建设始,400余万的干部、官兵、工人、知识分子及其家属陆续从东北、沿海等地区迁出,迁入甘肃、青海、宁夏、四川(包括重庆)、贵州、云南等地区。而且这只是初代移民,如果将“三线移民”的后代数量计算在内,则在千万人以上。这些移民至少带来了以下两个层面的改变:

其一,人口区域转换。一方面,从东北及沿海地区迁入大量的“三线移民”进入内地,既调整了中国整体人口的空间分布,又充实了西南、西北地区的人口数量。因“三线移民”多属汉族,因而改变了西南、西北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另一方面,三线建设的工厂、企业多分布在山区,伴随着生产投入与开发建设,不仅是“三线移民”,各部门生产招工和劳动力输入,还将周边各民族聚集起来,形成了区域性的人口集中与整体性的人口互嵌。

其二,人口类型转换。囿于三线建设的“军工”“国防”属性,移民群体主要包括勘测、设计、技术人员和广大生产职工,人员类型较为单一,人员结构以工业层面为主,明显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移民群体,构成特殊的移民社会。由于生产建设开展,“三线移民”与各民族长久地同生共息,形成互动互嵌式社会形态。“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可以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结构性保障。”<sup>[5]</sup>可以认为,三线建设仅从人口方面审视即改变了西南、西北地区的人员类型与社会形态。

以四川省攀枝花市为例,攀枝花原是中国西部一个偏远山村,因村口有一株古老而高大的攀枝花树得名,周边有彝族、傈僳族、苗族、白族等民族分布,区域内铁矿富集。1965年,因三线建设需要,国家组织成立攀枝花特区(出于保密原因更名“渡口市”),基于当地铁矿资源为基础建设钢铁厂,支援西南三线建设。一时间,10万冶炼、开采、制造、基建等技术人员与一线工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金沙江畔。随着钢铁衍生产业发展、家属不断迁入和人口生息繁衍,至1970年代,当地人口已超过20万人。经由“三线移民”与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攀枝花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荒野山区,不到20年即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

### 2. 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20世纪60年代,鉴于国际形势严峻与周边国家军事压力,党中央作出战略部署,秉持“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导思想,将沿边、沿海军工、

钢铁、煤炭、机械、化工、冶炼、电子、交通、能源等产业迁移至后方区域,旨在建立纵深,打造后方基地,堪称西部大开发的先行<sup>[4]</sup>,这一举措奠定了现今民族地区经济基础。

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工业体系建立。三线建设前,各民族地区工业基础较为薄弱,有些民族地区甚至没有工业,总体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经济水平较低。随着三线建设的铺展,民族地区迎来了钢铁、煤炭、电力、化工、机械、制造、铁路、邮电等产业的兴起,大批工厂、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工业体系初步建立,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二是城市化进程加快。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区位、资源等问题,城市化发展相对落后。开展三线建设后,相应产业布局带动了城市发展。如三线建设初期,陕西省各地的城市化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尤以铜川、宝鸡、渭南、汉中等地市发展较快<sup>[5]</sup>。又如青海省,因三线建设青海形成了三大工业区,加之兰青铁路、青藏铁路兴建,构成“三点一线”格局,诸多新兴工业城镇崛起,不仅城镇规模扩大,城镇空间亦大为拓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城镇产业类型及职能结构,实现了青海城镇体系的整体重塑<sup>[6]</sup>。三是交通运输改善。受限地理条件、经济支撑与技术制约,长时期以来民族地区交通较为落后,阻碍了与外界的交流沟通。交通运输事关国防战略,三线建设旨在解决这一难题。也因此,三线建设开始后,相应的铁路建设如火如荼,川滇、青藏(一期)、贵昆、成昆、焦枝、湘黔、襄渝等铁路及附带支线不断建立起来,相应的市(地区)、县、乡(镇)各级公路亦不断开辟,通往各民族村寨,改变了民族地区偏远、闭塞的历史状况。如成昆铁路修进四川大凉山时,当地的彝族欢呼雀跃,诚如《卡沙沙》中所唱“铁路修到了凉山下,彝家的心里乐开了花。炸开了高山架起了桥,一条铁路通到了我们家。卡沙沙,卡沙沙,修路的大哥卡沙沙”<sup>[7]</sup>,称成昆铁路为“幸福的巨龙”,表达了彝族人民对党和国家深切的感恩之情。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境内生活着汉、彝、白、哈尼、傣、纳西、藏、独龙、景颇等26个民族,安定团结极为重要,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历经10余年的三线建设,云南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布局更加合理,构成能源、交通、材料、生产、制造、加工、邮电等相结合的产业结构。与此同时,云南国防工业取得长足发展,至1980年已拥有航天、核工业、兵器、电子、

船舶等5个行业、共47个国防科技建设单位<sup>[8]</sup>。川滇、贵昆、成昆铁路开通和各级公路的兴建，既改善了云南各民族出行条件，又增加了内地人民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各民族日益成为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经由三线建设，云南各民族地区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基础设施愈加完善，昆明、楚雄、玉溪、曲靖等地区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城市和交通枢纽，国防工业保障了边境安定，为民族团结创造了较好的政治环境与物质基础。

### 3. 改善民族地区生活条件

军事、国防虽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但因三线建设的衍生、辐射、扩散影响已远远超过三线建设本身。三线建设厂房建造、企业兴办和各单位迁入，明确规定“三不四要”，<sup>①</sup>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如甘肃天水的三线建设，涉及仪器、精密电表、风动工具、铸锻、电器、轴承、机床、纺织、印刷、材料、机械、铁路等诸多领域，迁建企业多达40余家<sup>[9]</sup>，为天水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各民族创造了重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不仅如此，为保障移民的日常生活，也为改善三线建设所在地生产、生活条件，相应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立，如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中专、大学）、医院（卫生室）、银行、邮局、水库、水电站、道路、车站（火车站、汽车站）、饭店（食堂）、菜场、商店（粮油副食）、电影院、游乐场、照相馆、理发店等纷纷兴建，改善了周边民族的生活条件。或许三线建设之初出于保密和封闭，有些设施并不惠及周边民族，但随着1980年代的企业改制及政策放宽，各民族往来日益增多，附近民族纷纷进入三线建设工厂、企业务工，成为三线建设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贵州六盘水市同样是因三线建设为兴起的工业城市<sup>[10]</sup>。从1960年代三线建设开始，“十万大军”进驻黔西山区，就与周边彝族、苗族、布依族、白族产生各式各样的互动与交流，奠定了现今民族团结良好氛围。如兴建于六盘水市水城地区的水城钢铁厂（出于保密，代号为603），当时修建各类厂房选址“三块田”时涉及占用耕地，周边民族纷纷让出自有土地，支援国家建设，水城钢铁厂（以下简称水钢）成立后亦向附近各民

族村寨招工。鉴于厂区附近各民族生产、生活条件较差，水钢积极组织干部和职工开展各类生产建设与帮扶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组织“毛泽东语录学习班”，向周边民族宣传各类文化知识。三线建设初期，遇有语言沟通障碍情况，一般找既懂苗语或彝语、布依语又懂汉语的人充当中介人，互相传达，以增进交流；组织医疗队到附近苗寨送医送药，给周边民族义务看病，组织相应职工前往苗寨给苗族人民理发；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指导周边民族农业生产，到苗寨与苗族人民一起劳动，传授农业经验，如玉米种植方法、耕地劳作方式和农业生产技术等，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兴建水厂、水站、泵站，特别是开展“大河引水工程”，改善农田灌溉和用水条件，深受沿线民族支持，不到一个月即完工，是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实证；组织宣传队，宣传党和国家政策，传播汉语，推广普通话，进行文艺演出，既融洽了军民关系，又增进了各民族了解；水钢兴办的各级小学、中学供各民族职工子弟入学，提升了各民族的文化水平。如今这些学校已划归地方政府管理，既是区域社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又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宣传教育平台，培养了大批民族人才。<sup>②</sup>总之，因三线建设和各类产业发展，六盘水市各民族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

### 4. 丰富民族地区文化形态

“三线移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大花园，来自东北及沿海各个省份的汉族以及少量回族、满族等，人员来源可谓五湖四海。这些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西南、西北地区，亦将他们当地的语言（方言）、习俗、饮食、服饰、建筑、宗教信仰、节庆、民俗活动带入进来。“三线移民”并非都来自同一个省份城市（即便是同一个省份城市，其文化形态亦大有不同），而是来自北京、南京、西安、长春、沈阳、包头、齐齐哈尔、无锡、上海等多个地区，因地域、气候、水土不同，文化类型亦有不同。这些不同地区的文化在同一个地域里汇集、传承，与当地各民族交融共生，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以饮食文化为例，重庆是一座移民城市，数次历史移民不断增添这座城市的“味道”，三线建设与移民即是其中之一。三线建设时期，来自

<sup>①</sup>“三不四要”分别是：尽量不占良田好土、尽量不拆民房和搬迁社员、不搞高标准民用建筑，要支援农业用水、用电、用肥和养猪用粪水。

<sup>②</sup>以上资料来自笔者2023年8月20日至27日在六盘水市及首钢水城钢铁集团的田野调查。

东北及沿海地区近30万移民迁入重庆，相应地，这些山南海北饮食习惯和烹饪方法随即传入。如迁入的天津人喜欢面食不喜米饭，杭州人饮食偏甜、口味清淡，这与重庆喜麻辣、爱火锅的饮食文化并不相同。但经过时长日久相处，移民及后代在保留自身饮食文化的同时，逐渐接受重庆的饮食文化，能吃一些麻辣，花椒、折耳根、豆瓣酱亦来者不拒；而重庆当地居民亦不断接受移民各类饮食文化，水饺、刀削面、“合子饭”、馄饨等进入重庆大街小巷，构成相互学习、交融汇聚的景象。“外地移民在三线地区饮食的适应和变迁，就是一个土客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sup>[11]</sup>“三线移民”所携带的外来文化与重庆当地文化有机融合，更进一步深化了今天重庆开放、和谐、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

### 5. 强化民族地区国家认同

当国家号召开展三线建设时，来自全国各地数百万干部、工人、技术人员背井离乡，前往偏远山区扎根，支援三线建设，扎根异乡，孕育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当时流传“好人好马上三线”，这是一项“光荣使命”，可见加入三线建设浪潮人员的国家认同非常之高。“三线精神”是建立在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信仰基础之上的，“建好社会主义”“保家卫国”“家国同构”是诠释“三线精神”内涵的真切写照。“‘三线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革命精神’是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的关系。”<sup>[12]</sup>这样一群正能量移民群体与周边各民族长期生活、劳动，能够充分带动、影响各民族的内心情感，深刻感染各民族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更加热爱祖国、更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增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如今，矗立于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博物馆，记录着当年的岁月、故事和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地。

“三线精神”和“三线人”故事永不过时，应赓续往日光辉，照耀当代。“三线移民”深怀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落地生根，工作、恋爱、结婚、成家、立业、生子皆在此完成，久之“他乡”成“故乡”，“故乡”成“远方”，有关三线建设的厂房建筑和过去经历，构成了深刻的集体记忆，犹如旋转的时空，维系着边疆与内地的深厚情感，“是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真实历史写照”<sup>[13]</sup>。不论是形体的三线建设工业遗址，抑或无形的精神与记忆，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应积极加以

传承利用，传承红色血脉。当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线建设是重要思路源泉与经典实证素材。

## 三、三线建设促进民族交融互嵌的特点

三线建设诠释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保障国家安全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光辉篇章。“三线建设的举措涉及工业、交通、国防、科技设施等多方面，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火热实践，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财富。”<sup>[14]</sup>审视三线建设促进民族交融互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国家政策主导、经济因素助推、层级交互突出和群体涉入多元等层面，体现出三线建设的特殊性、时代性和长久性。

### 1. 国家政策主导

国家政策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动力机制。政策的制定与推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效度。一是推拉力，在各民族人口流动与交融尚未形成之时，制定相关政策，推动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二是凝聚动力，当各民族形成交融互嵌态势之时，通过相关政策强化族际纽带，形成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繁荣局面；三是联结动力，制定惠及各民族、各地区、边疆与内地，联结不同年龄、职业、性别、信仰、风俗的政策，深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线建设由国家主导，是基于国家发展形势与国内外局势自上而下作出的重要决策，跨越时间长，辐射范围广，涉及多个领域、多个方面的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国防、医疗、户籍、婚姻、交通，乃至艺术、文学、民俗等各个方面，引发了多种形式、不同程度的人口流动与交融互嵌。经由三线建设推动，“三线移民”与各民族形成利益上相互依存、价值观上协调统一、命运上交融一体，最终更深入推动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 2. 经济因素助推

发展是解决中国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巩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融互嵌，尤当重视发展经济。相对沿海及内地经济基础与区位优势，民族地区多处山区，交通落后，经济开发与社会建设较为滞后。但民族地区多民族交错杂居，自然资源充沛，文化资源丰富，人文环境独特，地理位置重要，发展空间较大，迂回调整较强，

有着无以比拟的特色和优势。如何妥善解决这层关系,事关重大。

三线建设虽是因国际形势变幻调整国防布局,打造后方保障,但也有着眼于平衡内地与边疆经济建设的统筹谋划,大范围的人口、工厂、设备迁入西南、西北地区,改变了民族地区长期贫困落后局面,缩小了边疆与内地的差距。不仅如此,三线建设以经济带民生,民族地区教育、医疗、交通、就业形势、农业生产条件与耕种技术日渐改善,各民族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因经济发展与推动,从生活到工作,从城市到乡村,历经长时段型构,“三线移民”与各民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互动与互融。

### 3. 层级交互突出

其一,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等方面互动互嵌互融。从国家层面而言,三线建设是一项国家政策,以国家力量从战略上整体规划,调整人口分布、产业布局,事关国家发展与建设,对各民族互动与交流影响深远。无论是“三线移民”,抑或西南、西北各民族,皆因国家政治调控,人生轨迹由此产生交织,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二,教育、医疗、交通、工作途径等方面互动互嵌互融。从社会层面而言,三线建设不仅是国防、科技、军工等领域,随着“三线移民”迁入,相应的学校、医院、企业、商店建立起来,地区间铁路、公路兴建,惠及周边各民族,日常出行、生活工作、休闲娱乐皆与之息息相关,融洽了各民族关系,加强了城乡沟通;

其三,语言、饮食、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互动互嵌互融。从个人层面而言,“三线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在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周边各民族既有一定共同性,又有一定差异性,彼此在同一个区域里长久地同居共处,相互包容、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进步与发展。

### 4. 群体涉入多元

推动三线建设的核心和根本是国家力量、国家机制,但关键在于各民族的接受和参与,各民族人口流动与交融政策机制也在于不同群体的实施和推动。三线建设调动了全国多个群体:一是参与民族,大江南北、边疆与内地56个民族积极投入到三线建设中;二是身份职业,既有技术人员、工人、军人、知识分子,更有农民、教师、学生等,响应国家号召;三是地域籍贯,无论来自东部、西部,北方、南方,抑或沿海、内地与

边疆,彼此协同奋进,心系祖国、共建家园;四是年龄层次,三线建设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不同民族的老人、小孩、青年、中年,抑或三线建设一代、二代、三代乃至四代,皆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不同年龄段和代际之间形成多重形式的互动。民族互嵌型社会具有构建有机民族团结的基本功能<sup>[15]</sup>。三线建设创造的民族互嵌型社会,经由不同群体间接触、碰撞与交流,再经过长时间的相处,自然而然地交融。

## 四、结论与讨论

回溯历史,始于1960年代的三线建设,不仅是国防军工建设之路,更是民族团结建设之路。虽然时至今日,有关三线建设诸多厂矿、企业面临关停、改制或转型,但三线建设社会效应和历史影响依然在持续,三线建设记忆与精神依然值得大力传承。从历史移民角度考察,西南、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各民族集中聚居又多民族交错杂居,成千上万的工厂、企业、机构、单位迁入和建立,数百万移民迁徙,历经时间沉淀和岁月积累,既促进了西南、西北地区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密切了内地与边疆联系,更推动了各民族广泛而深远的互动互嵌互融。

关注现实,三线建设只是中国历史移民的一部分,自先秦伊始,有关移民的记载不绝于书,既有政策性移民、屯垦性移民、军事性移民,又有谪戍性移民、自发性移民和灾害性移民,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移民,产生民族交融互嵌程度、广度和深度略有不同。笔者粗略认为,考察民族地区社会历史与社会治理,勾勒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实态,叙述边疆与内地整合历程,构建安定环境和建设和谐社区,基于移民问题管窥,既克服了传统“问题-对策”研究范式弊端,又弥补了诸如现今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研讨的不足,在纵向与横向间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当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积极吸纳中国历史上移民治理的经验与智慧。而分析和总结历史移民的内涵、特点及其规律,更是构建各民族人口流动与交融“中国经验”的有益尝试。

### 参考文献:

- [1] 马英民.当代中国建设史上的创举:三线建设[J].北京党史研究,1997(1):23-27.

(下转第507页)

- 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41.
- [20] 孙伯君. 胡汉对音和古代北方汉语[J]. 语言研究, 2005(1): 66-72.
- [21]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M]. 毛远明, 校注. 北京：线装书局, 200: 285.
- [22] 柏贵喜. 四至六世纪内迁胡姓家族制度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02.
- [23] 王兴振. 徒何流变考[J]. 东北史地, 2014(1): 82-89.
- [24]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 1956: 4393.
- [25] 马长寿. 乌桓与鲜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254.
- [26] 邓名世. 古今姓氏书辩证[M]. 王力平, 点校.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580.
- [27] 姚薇元. 北朝胡姓考[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11.
- [28] 陈毅. 魏书官氏志疏证[M]. 北京：中华书局, 1955: 4644.
- [29] 韩愈. 韩昌黎文集校注[M]. 马其昶, 校注. 马茂元, 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372.
- [30]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2399.
- [31] 周伟洲. 陕西北周墓葬与民族问题[C]//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11.
- [32] ALBERT E · DIEN. The Bestowal of Surnames under the Western Wei-Northern Chou: A Case of Counter-Acculturation [J]. T' oung Pao, 1977(3): 139.
- [33] 严耕望.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837-851.
- [34] 万绳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231.
- [35] 康乐. 代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拓跋魏的国家基础[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三分, 1991: 584.
- [36] 王永平. 墓志所见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学术文化积累之提升为中心的考察[J]. 学习与探索, 2011(3): 259-264.
- [37] 窪添慶文. 志を用いた北魏史研究[M]. 东京：汲古书院, 2017: 355-361.
- [38] 于涌. 华夷身份转换与北魏文化的正统认知[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6): 119-125.

(责任编辑 王莉)

(上接第490页)

- [2] 苏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三线建设决策与实施成效探究[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5(5): 48-54.
- [3] 郝亚明. 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逻辑[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9(3): 8-12.
- [4] 王庭科. 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J]. 党的文献, 2000(6): 11-17.
- [5] 岳珑, 王涛. 政府宏观规划与地方城市化：“一五”计划、“三线”建设与陕西城市化初探[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1(1): 93-97.
- [6] 崔一楠, 喻双全. 三线建设与青海城镇发展研究[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0, 27(3): 115-126.
- [7] 张儒. 凉山彝家幸福路：寄自凉山的报告[J]. 中国民族, 1982(10): 21-24.
- [8] 晁丽华. “国防一线”的“三线建设”：云南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J]. 学术探索, 2009(4): 103-108.
- [9] 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 甘肃三线建设[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3: 37-359.
- [10] 段晨. 三线建设下的民族交融与区域发展：以贵州六盘水地区为例[J]. 民族艺林, 2024(3): 18-31.
- [11] 张勇. 区隔与融合：三线建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J]. 江海学刊, 2020(1): 206-216.
- [12] 朱云生, 何悦. 三线精神的历史生成逻辑与精神内涵[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14): 12-14.
- [13] 陈君锋, 崔一楠, 徐江山. 以建促融：三线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四川省为例[J]. 民族学刊, 2023, 14(9): 26-37.
- [14] 杜华君. 三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财富[N]. 中国民族报, 2022-12-13(6).
- [15] 郝亚明. 民族互嵌型社区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分析[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6(4): 14-20.

(责任编辑 王莉)